

确保空军指挥与控制机制适应 21 世纪联合作战需要

Reenabling Air Force Command and Control for Twenty-first-Century Partnerships (English)

菲利普·布里德勒夫，美国空军中将 (Lt Gen Philip Breedlove)

布莱恩·泰勒，美国空军少校 (Maj Brian Tyler)

时机已到，美国空军应调整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 (C2) 机制，视之为当前复杂安全环境中开展联合作战的一部分。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参谋部发布了联合作战准则 JP 3-30《联合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的最新版本。¹ 和所有的作战准则一样，JP 3-30 的发布标志着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这部准则是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联合努力的结果，归纳了各军种在天空和太空开展 C2 运作的经验和理解，给今后的联合部队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提供了权威指导。文件中包含若干重要的概念，例如主战区和次战区联合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 (JFACC) 的组织协调、空中部队协调单位的作用、对遥驾飞机的 C2 运作，以及指派 JFACC 负责太空作战协调权限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JP 3-30 的发布也标志着新一轮修订从此开始。信息时代的演变要求我们连续改进；我们空军也始终在创新求变，立志保持在天空、太空和网空领域的优势。现在有了新版 JP 3-30 为我们的联合部队阐明当今空中作战的 C2 原则，我们鼓励空军官兵重开讨论，思考如何为着明天的联合作战建立最有效的天空、太空和网空部队指挥与控制机制。

这场讨论应关注两个全局性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联合部队各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另一个是关于作战灵活性。在第一个问题上，指挥官个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比指挥体系关系更加重要。历史上有过很多成功合作的范例：罗伯特·李将军和托马斯·杰克逊将军、欧

玛·布雷德利将军和埃尔伍德·丘萨达少将、诺曼·施瓦兹考夫将军和查尔斯·霍纳中将、汤米·弗兰柯斯将军和迈克尔·莫斯利中将，等等。这些伟人（及其参谋人员）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频繁互动，共同应对困境，及至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无论我们今后如何组织空中部队和 C2，我们都必须有意识地加强联合指挥官和联合策划人员的相互接触，以期加强联合信任，从而实现统一（联合）指挥和（联合）效果的永恒原则。当杰克逊将军在 1863 年的钱萨勒维尔战役中受伤阵亡之后，李将军悲痛地说，他失去了右臂。如果空军官兵对联合部队的其他伙伴单位也保持同样强烈的感情，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再谈作战灵活性问题。未来联合部队的空中部队必须充分利用天空、太空和网空力量的速度、远程和灵活性等优势，做到快速响应，值得信赖，胜任各种安全挑战。国防部长盖茨在介绍 2010 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时说，“美国需要拥有广泛的军事能力和最大程度的普适性，能应对最宽广冲突频谱内的各种事件。”²

假定资源是有限的，那么我们的打击能力就在于灵活性。灵活性在我们的兵力结构、兵力体现、作战能力、使命和流程中都不缺少，其意义重大。就 C2 而言，JFACC、联合部队空中作战中心和整个战区的空地系统必须能够执行从大型突发事件到平叛和人道救援在内的各种作战行动。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精通集中规划流程（如战略打击），也要精通分散规划流程（如平叛），既能有效提供整

体支援,也能有效提供直接支援。我们的联合部队和联盟部队伙伴都知道,不存在所谓“一付药方包治百病”的普适方法,因此 JFACC 必须审时度势,灵活指挥和控制天空、太空和网空部队。

再者,随着美国陆军向旅级战斗单位建制过渡,把以前由师级单位控制的资产下放到旅级,我们的作战灵活性就变得更加重要。当间接火力、防空和情监侦资产分散运作时,原本就复杂的空域控制和区域防空就变得更加复杂。尽管如此,如果联合部队对快速响应和资产保证的要求超过集中使用和效率的优点时, JFACC 就必须及时调整,适应变化,否则将被边缘化。

最后,我们关于未来 C2 的讨论还应该关注网空领域今后的发展。2010 年 5 月,美国参议院确认了基斯·亚历山大将军 (Gen Keith Alexander) 担任美国网空司令部司令的任命。我们空军采取了一些关键行动支持国防部在网空领域的建设,包括指派第 24 航空队作为网空司令部内的空军部队。在我们探索网空作战的 C2 时,联合部队各单位的相互信任和作战灵活性仍有直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集中执行网空作战 C2 是恰当的。

但是我们也能想象,当某个联合作战区域内某些网空作战行动的协同和响应能力对战役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时,则有必要移交某些特定的 C2 权限。就像 JFACC 可以承担太空作战协调权限一样,他们也能向联合部队指挥官们请求承担网空协调权限。空军指挥官、太空指挥官以及空天作战中心太空专业人员在第 14 航空队和太空界内建起的桥梁,给联合部队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在网空领域,我们能否建起类似的桥梁,把联合部队指挥官们和相关的网空作战能力联结起来?

JP 3-30 体现了 JFACC 和 C2 的成熟程度有了巨大提高。现在,开展另一场关于天空、太空和网空力量未来 C2 的健康讨论及反思的时机已经来临。♣

注释:

1. Joint Publication 3-30, Command and Control for Joint Air Operations [JP 3-30: 联合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 12 January 2010,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3_30.pdf.
2.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M. Gates, "Defense Budget / QDR Announcement" [国防预算 /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发布声明] (speech, Arlington, VA, 1 February 2010),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416> (accessed 18 June 2010).



菲利普·布里德勒夫,美国空军中将 (Lt Gen Philip Breedlove, USAF), 乔治亚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理学士,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理科硕士, 国家战争学院理科硕士, 现在华盛顿特区美国空军总部担任负责作战、规划与要求的副参谋长, 就制订支持天空、太空、非正规战争、防扩散、国土安全、气象和网空作战等领域的政策策略向空军部长和空军参谋长负责。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关空军作战的代表, 他负责审定支持国家安全目标与军事战略所必需的作战要求、能力及训练。担任现职以前, 他曾任驻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第三航空队司令官。他是指挥飞行员, 拥有超过 3,500 小时的飞行经验, 主要飞行 F16 战机。布里德勒夫中将曾在“联合锻造 / 联合监护行动”中执行过作战飞行。



布莱恩·泰勒, 美国空军少校 (Maj Brian Tyler, USAF), 美国空军学院毕业, 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硕士, 现就读于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大学高级空天研究院。此前他作为空军研究员派赴华盛顿特区美国空军总部作战、规划与要求部从事战略政策实习。泰勒少校参与过欧洲、非洲和阿富汗的信息与网空作战的战役层规划。他也曾多次主导朝鲜半岛及伊拉克上空 U2 与 RQ1 使命的情监侦收集、处理、运用和发布行动, 并担任第 67 网络作战大队分队长、联盟联合特种作战空中中队情报副主任, 及西南亚联合特遣部队情报收集主管。

免责声明

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 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